

本书的目的是系统分析“亚太三雄”——中美日三国的对外战略。以上各章讨论了三国关系演进的动态，如竞争、合作与冲突，聚焦每个国家的战略考虑和政策制定过程。本章运用宏观与微观相连接、内外因素相结合的研究方法，¹ 首先分析国际政治中大国敌友关系转变的五大影响因素，然后探讨“亚太三雄”关系演进的八个历史互动节点。本章还进一步论述崛起大国（中国）与主导大国（美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图景，讨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便我们能全面理解中美日大国战略和中美日三角关系。

一、朋友和敌人之间的角色转变

二战结束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在国际政治中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能够永久的只有国家利益”。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大国之间的敌友关系转变呢？诚然，诸如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这些可以被认为是永续存在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总是能充当理解不同国家对彼此态度的背景信息。然而，如果我们只依靠这些永续存在的影响因素将很难解释国际关系的动态变化。“亚太三雄”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经常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为了回答该问题，本章聚焦推动“亚太三雄”关系动态变化的五个最主要因素，包括国家利益优先顺位、实力分配、联盟、外交折冲、国内国际互动。然后，本章论述从19世纪中期至今“亚太三雄”关系互动变化的八个重要节点。

（一）“亚太三雄”关系转变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之一：国家利益优先顺位

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利益是每个国家对外战略考虑的顶级优先。一旦其优先顺序发生变化，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方向可能也会发生重大转变。

让我们以中国为例。1949-197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初的27年，

可以被称为“毛时代”。如果我们只使用一个词总结那个时代的内外政治特点，那就是“革命”。在国内，“革命”是通过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付诸实践，而在外交政策上，中国关注的是世界革命，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被看作第一世界的霸权国家。属于第二世界国家的西欧和日本是潜在的朋友，中国愿意努力说服它们保持中立并争取它们支持第三世界国家。

1978年邓小平恢复权力之后，开启了他的“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如果我们使用一个词概括邓时代，这个词应该是“现代化”。中国从革命到现代化的优先顺位转变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现代化”在国内前沿的体现就是经济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在外交政策上，现代化是成功实现对外开放，特别是向西方开放。通过对外开放，中国可以获得现代化道路所急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中国外交政策从“世界革命”向“现代化”的战略转变，改善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不只是西欧国家，还有中国的老对手美国和日本。

日本也经历了近代史上国家战略的转变。第一次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富国强兵”和“脱亚入欧”这两个口号说明了日本那时的最重要政策优先。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现了从封闭、落后的岛国到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同时，日本开始追随其他西方殖民帝国，走向军国主义，入侵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²

1945年彻底战败成为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二个历史转折点。战后吉田主义强调去军事化、民主化和经济增长，这成为日本国家利益的核心，指引日本的政治发展和外交政策。诚然，日本的转变是在各种外部因素的压力之下实现的，如美国的占领、韩战的爆发、冷战期间美苏两极对抗等。

虽然美国在日本这一阶段的发展方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正是因为日本（在美国的指导下）重新界定其核心国家利益，为日本独特的战后外交政策新方向奠定了基础，从外部改变了它的敌人和朋友。这些关于中国和日本案例说明国家优先发展方向的变化对外交政策方向的影响，导致敌友关系

的转换。

影响因素之二：实力分配的变化

实力分配的变化是造成大国合作与竞争关系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方面，最著名的理论之一是权力转移理论。³ 也可以从近期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经常用在守成国对崛起国的政策分析中看到。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权力转移，这次权力转移使日本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全方位超越中国。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被迫在 1895 年签订《马关条约》。该条约标志着东亚第一次权力转移的完成。随后几十年，日本开始大规模军事入侵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由于其自身实力的不断下滑，日本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日本与世界霸权国美国展开长期贸易战，最终被严重削弱。90 年代，日本经历了经济衰退和泡沫破裂。美国不再把日本视为对手，并于 1996 年与日本签订《美日安保条约》新指针。日本的大起大落为实力分配的变化能够影响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第二个案例是中国。从鸦片战争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是一个落后、分裂和弱小的国家。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主要发生在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几十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10%，持续达 40 年。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外，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大国。因此，中国是权力转移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挑战了当今世界霸权美国的地位。2018 年特朗普总统对华发动贸易战反映了美国重新界定与中国的关系——不再是伙伴而是竞争对手。⁴

影响因素之三：同盟

第三个因素是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取决于其盟友体系。一个国家决定与另一个国家结盟取决于他们是否将成为合作者或竞争者。这可以在冷战时期的联盟中得到最佳解释，那时世界被划分成为两大阵营——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和苏联签署“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中国正式与苏联结成同盟。另一方面，日本与美国签署安保条约并加入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中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方向是以他们各自的盟友地位形成的。因此，中国与美日两国的关系从那之后转变为对手，因为美国和日本同属于对立的资本主义阵营，⁵ 完全翻转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大国关系。

影响因素之四：外交折冲

上述三个因素都是随着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然而第四个因素强调外交策略调整的重要性。

1972 年，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这是美中关系中的第一次。几个月之后，田中角荣也访问中国，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都是“亚太三雄”之间成功外交的经典案例。

推动“亚太三雄”团结起来的最重要国际因素之一，是当时这三个国家都把苏联的扩张主义视为各自的首要威胁，共同的敌人使这三个国家走到一起。然而，如果当时美日两国的领导人没有敏锐的战略思维和娴熟的外交技巧，主动与中国接触，那么与中国改善关系是不可能的。

这里还有一个案例。2018 年底，韩国总统文在寅利用首次举办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契机，巧妙地实现对朝外交的重大突破，结果促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使半岛形势从几个月前的战云密布转到谈判桌上来。文在寅、金正恩和特朗普的外交策略调整突显了亚太国际关系中相关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技巧和灵活身段。

影响因素之五：国际 – 国内连接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其内政的延伸。如果你不能很好理解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你将经常误解该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例如，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美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主要是由于美日贸易摩擦。日本被认为“偷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因此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导致美国朝野同仇

敌忾，一致要求“敲打日本”。这也导致日本内部出现脱离美国的呼声，从而产生了“同盟漂流”的现象。

美国外交政策界非常重视新的理论观点的提出，因为其往往会带来新的政策方向，即所谓的“理念先行”。美国国内政策辩论涉及的不仅是学术界和智库，还有政府中的决策者。例如，“中国威胁论”在1990年代初被首次提出，此后数十年一直存在于美国外交政策界。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威胁论已经成为政策实践，标志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出台。中国威胁论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最终成为政策共识。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⁶称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或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界定的“不可避免的对手”。⁷2021年正式就职美国总统之后，拜登同样确认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并建议与中国在未来进行长期竞争。中美关系中的斗争与冲突可能成为常态。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精英首先提出理念，然后达成共识，最后采取行动制定正式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过程。

平衡者的重要性

在任何三角关系中，总有一个“二对一”的博弈。自然，每一方都想将自己定位在“二”的那一边，即确定一个主要对手，并将第三方作为自己的盟友或朋友。没有一个国家想被推到“一”的那个角落，并受到另外两个国家的联合挤压。所以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中，第三方的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⁸

在日本外交政策的内部辩论中，就明显呈现出两派思路。执政的自民党和外务省的主流思维强调“1 + 1”大于“1”，意思是中国是主要竞争者，日本需要做的是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根据这一论点，无论中国未来变得多么强大，它都不可能超过日本和美国的总和。

另一方面，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20年，虽然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但几乎是日本的三倍。由于中美之间的竞争趋势十分明显，因此日本可以起到平衡的作用。如果中国与日本联

合，美国将会担忧。美国是绝对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对日本内部的离心倾向一定要控制在萌芽状态之中。

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态度变化是个典型案例。让我们从中观察美国的立场变化——从最初的“中立”立场，到后来通过对美日同盟条款的重新解读提出美国会介入。换句话说，中日之间的争端加剧，加强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

总之，我们必须仔细审视上述影响因素以理解当下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和敌友关系转变，以及平衡者的作用。在此意义上，日本作为中美两强之间的平衡者将毫无疑问使其成为中美双方争夺的对象。谁赢得日本的支持，谁就会在这场大国竞争中占上风。因此，日本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如果竞争因素减少，合作因素增加，那么“亚太三雄”之间有可能实现“三赢”的局面。

“亚太三雄”互动的八个历史节点

在地缘政治背景下，“亚太三雄”的大国博弈是理解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变化的一个很好的研究主题。外交政策问题的分析层次必须聚焦于国内因素和国际环境的互动。两个方面可以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本章主要从两个层次探讨“亚太三雄”的大国博弈——国际关系层次和外交政策制定层次。

据此，笔者在这里提出在过去两个世纪“亚太三雄”之间互动关系的“八个节点”分析框架，来分析中美日三国的具体外交政策。然后，笔者沿着敌友关系转变的主线，具体分析“亚太三雄”之间从过去到现在的互动。

说到中日关系，其起源可以一直从远古追溯到明清时期，然后一直到近现代，两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谓源远流长。美国虽然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有商船来华从事贸易，但直到19世纪中叶才开始在东亚地区扮演重要角色。笔者选择历史长河中的一些主要事件作为“亚太三雄”之间互动的八个节点。

节点之一：从鸦片战争到明治维新（1839–1868）

“亚太三雄”互动的第一个节点是在 19 世纪中期，在此期间西方列强进入东亚地区。这一过程可以被看作既是西方殖民入侵，又是如费正清提出的“刺激反应模式”的体现。⁹

在此时期，重要事件有美国与中国清王朝在 1844 年签署的《中美望厦条约》、佩里探险队于 1853 年到达日本，也被称为“黑船事件”。在此期间，中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通常被称为“朝贡体系”）经历了急剧下降。就“亚太三雄”而言，关键的初次相遇是《中美望厦条约》和美国的“黑船”进入日本。

1840–1842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放弃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鸦片战争和 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耻辱百年”的起点。作为西方列强的一员，美国在英国的带领下进入东亚，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如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在一定程度上，“中美望厦条约”是对《南京条约》的模仿。英国通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获得巨大好处之后，其他欧洲和美洲列强也希望用同样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

“中美望厦条约”也称为“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开放五个中国港口进行贸易和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部分内容与中英《南京条约》相似；第二，给予美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购买土地、传教和建立教堂的权利；第三，规定在美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在法律实践中被称为“治外法权”。因此，“中美望厦条约”是中美之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再看日本，虽然美日之间的官方往来始于 1846 年，当时美国向江户幕府提出开放贸易的建议，但被忽视。几年之后的 1853 年，美国派遣由四艘船只组成的舰队，在陆军准将马修·佩里将军的率领下，到达江户湾，也就是现在的东京湾。历史上被称为“黑船来航”，也被称为“黑船事件”。

此时，恰好江户幕府的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去世后不久，佩里舰队的到来在江户引起巨大混乱。由于内部混乱和外部压力，日本于 1854 年同

意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这是日本与外国列强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打破了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条约内容包括美国人可以合法居留，享受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并保证美国船只可以向日本提供货物和原料。

从此之后，幕府开始与西方列强逐步建立贸易关系，开办新的西式学校，派遣外交使团，间接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和日本在东亚的崛起奠定基础。

节点之二：从日本崛起到日本侵略亚洲（1868–1931）

第二个节点的标志性事件是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和美日“塔夫脱－桂太郎协定”的缔结。自明治维新以来，随着“富国强兵”口号的提出，日本经历了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从那时起，日本开始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并挑战中国的霸主地位。¹⁰

这一节点始于 1868 年明治维新初期，一直持续到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击败清政府，并强迫中国于 1895 年签订《马关条约》，然后日本又在 1905 年打赢了日俄战争，使日本取代中国成为地区霸权。《马关条约》强迫中国割让台湾省给日本，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该条约也为日本能够掠夺中国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晚清时期，由于发生于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进一步加深。

美国开启其殖民主义政策比其他欧洲列强相对较晚。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美国发起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如门户开放政策。该政策要求东亚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商业利益上要给予美国同等待遇。而且，当日本海军在 1905 年的对马海战中获得决定性胜利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作为调停者对日俄战争进行干涉。由于他的成功调停，获得 1906 年诺贝尔和平奖。在 1905 年签订的“塔夫脱－桂太郎协定”指导下，美国与日本在亚太地区建立了和平共存关系。日本首相桂太郎和美国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秘密达成一项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备忘录，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美国承认日本控制朝鲜半岛和 1902 年签订的英日同盟。